

# 人口流动、信息媒介与公众环境知识<sup>\*</sup>

包智明 颜其松

**提 要:** 流动性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本文基于 CGSS2013 数据,以流动性理论为分析视角,以信息媒介为中介变量,将环境知识分为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分析了人口流动、信息媒介对公众环境知识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日常环境知识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对专业环境知识无直接影响。传统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的直接影响大于网络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的直接影响。同时,相对于传统媒介来说,网络媒介对专业环境知识的直接影响更大。中介分析发现,人口流动通过传统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的间接影响更大,网络媒介在人口流动与专业环境知识之间的中介效应更大。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发现不同信息媒介在传播不同环境知识方面的效应存在差异,这有助于在流动性社会中完善普及环境知识的相关政策措施。

**关键词:** 人口流动 信息媒介 环境知识 社会融入

## 一、引 言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包括生态建设和社会建设两大方面(洪大用,2013)。其中,公众的环境知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文基础。社会学讨论的公众环境知识主要是指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包括对环境问题成因、环境问题影响、环境保护以及环境治理等内容(洪大用、范叶超,2016; Jensen, 2002)。有关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及其社会效果的研究是中国

---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文化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ASH014; 主持人:包智明)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生态文明建设中公众亲环境行为形成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YJC840034; 主持人:颜其松)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洪大用，2013），以往多项研究表明，环境知识能对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产生积极作用（Stern，2000；朱慧，2017；施生旭、甘彩云，2017）。目前我国主要依靠学校、企事业单位对公众开展环境知识教育。这些制度性的环境教育机制对公众普及环境知识发挥了正向功效。但多项实证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不同社会群体的环境知识水平较低（王文略等，2018；朱慧，2017），极大地制约了公众环境行为水平的提升。落实和巩固生态文明制度需要结合时代特征，采取多元渠道面向公众传播环境知识，推动公众环境知识的增长。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提升，人口、物质、资本和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流动。与早期工业化的固态特征相对应，流动性被视为现阶段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其中人口流动是流动社会的基础，人口流动又进一步促进信息等要素的流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促进了人际关系与知识的交融互通。在此情况下，人们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渠道获取的知识量大幅增加，网络媒介在传播知识信息方面的地位得到大幅提升（刘少杰，2012）。

现代中国正进入流动性社会。流动性既是我国社会治理的突出问题（吴越菲，2017），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洪大用，2017）。因此，我国社会治理应积极面对这一基本事实（张康之，2019a）。流动性社会背景下，面向社会公众传播环境知识，既要面对人口流动性大、传播对象不固定的困局，也要借助流动性资源拓展环境知识的传播渠道。一方面，我国现阶段存在大量流动人口，特别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国家和社会应向他们提供更多环境教育服务，但问题是常规性环境教育又难以覆盖农民工等流动人口。另一方面，社会的流动性特征也为流动人口获取现代科学环境知识提供新的资源和渠道，而信息媒介为环境知识的普及带来便捷。现有部分研究已证明了网络等信息传播渠道能提升人们的环境知识（程萧潇、孟伦，2016；周全、汤书昆，2017），但是现有研究并非基于流动性视角，缺乏从流动性要素角度研究公众环境知识的影响因素和机制。

根据信息媒介的类型和环境知识的深度，两个变量各自都还能进一步细分。对于信息媒介，根据信息依托的媒介差异，可将其分为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两类。不同类型的媒介，其信息内容、信息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也会存在差异，公众对不同媒介的使用习惯和接受程度也会因人口特征而存在差异。对环境知识的类型划分有多重标准，根据环境知识的深度和推广、应用领域不同，环境知识可以划分为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段文杰等，2017）。日常环境知识源于公众直接的生活体验，称为直

接经验知识或感性知识，而专业环境知识属于科学知识范畴，需要系统设计与论证，属于理性知识（张康之，2019b）。现代社会里，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都会通过信息媒介传播给大众。对信息媒介和环境知识进行类型划分，有助于比较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在传播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方面的效果与机制差异，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因此，本文基于流动性视角，以信息媒介为中介变量，探讨人口流动、信息媒介对公众获取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的影响机制。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卡斯特（2001：284）认为全球化趋势下虽未完全形成全球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但是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和全球竞争下的弹性管理模式加速了高层次知识生产者的全球流动，而以媒介为载体的信息传播对高层次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发挥了中介作用。鲍曼（2013）也认为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将瓦解传统的固态性，形成以人口、信息和资本流动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分层模式。可以看出，主要的流动性理论学者认为，人口和信息是全球化与信息社会主要的流动要素。但这种阐释停留于宏观理论层面，缺乏对中观层面具体机制的阐释。因此，本文在流动性视角下，对以往有关人口流动、信息媒介与公众环境知识关系的研究进行梳理，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 （一）人口流动对环境知识的影响

人口流动是流动社会的主要体现，也是流动性社会的基础，人口流动会重塑人地空间关系和社会关系（吉登斯，2000：18；王谦、文军，2018），包括人与环境的分离与重组（鲍曼，2013：9）。人口流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社会群体间环境知识的交流，流动人口对与环境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认识也会随之变化。首先，人际交流可以增强流动人口与流入地人口的融洽程度，使其在融洽的人际关系中获取新的环境知识。国内的相关研究从人际交流能促进环境知识信息共享的角度，指出进城农民在与城市居民的人际互动中能获得更多环境知识（何兴邦、周葵，2016）。其次，除了人际关系层面的融洽外，一些经验研究认为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社区的程度更能提升其环境知识水平，流入地社区的人群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会带动流动人口对环境知识的需求，流动人口融入社区的程度越深，他们的环境知识水平得到提升的可能性会更高（Wong

et al. , 2019; Qin & Flint , 2012) 。此外, 流动人口并非单向接收新的环境知识, 他们在融入社区的过程中, 也会向流入地居民输出流动人口以前拥有的本土性环境知识, 流动人口在双向互动中, 对新的环境知识会加以辨别, 能获取更高质量的环境知识 (Pfeffer & Stycos , 2002) 。以往的经验研究更多地分析了流入城市的农民与其环境知识的关系, 虽然有研究涉及到非农民的流动与环境知识的关系 (Kamaludin & How , 2016; Gu & Ma , 2013) , 但这样的研究相对较少, 也欠缺对人口流动与不同环境知识关系的讨论。基于以上文献的讨论, 本文认为流动人口在已有日常环境知识储备的基础上, 也会从流入地获取新的日常环境知识。但是, 相对于日常环境知识来说, 专业环境知识是在专业领域应用的知识, 应用领域和推广面都较窄, 对于流动人口来说, 难以获取比非流动人口更多的专业环境知识。据此, 我们提出假设 1a 与假设 1b。

假设 1a: 相对于非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的日常环境知识水平更高。

假设 1b: 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在专业环境知识水平方面并无显著差异。

## (二) 信息媒介对环境知识的影响

信息传播是指信息通过各种媒介在不同的个人、组织和群体间进行传播、扩散的过程。公众通过使用各类媒介, 获取和扩散信息。较早的研究认为传统大众媒介在传播环境知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会播放或登载一些对生态环境影响面较广、公众结合日常生活易于理解且较为常用的环境知识 (Ostman & Parker , 1987; Brothers et al. , 1991)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是公众接触日常环境知识最有效的途径 (Sampei & Aoyagi-Usui , 2009; Lee , 2011; Chan , 1998)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 网络媒介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格局, 环境知识的传播亦受此影响。环境主义者借助网络媒介传播环境知识和环境信息 (卡斯特, 2006: 150) 。近年来, 一些研究发现网络社交媒介对提升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有良好效果 (Robelia et al. , 2011; Westerman et al. , 2014) 。但前述研究只单独分析了网络媒介对环境知识的影响, 缺少关于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的影响差异的比较。电视、广播和都市报刊等传统媒介为了留住和吸引更多受众, 他们需要传播更多与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信息, 以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相对于专业环境知识来说, 日常环境知识与公众的日常生活实践联系更紧密。因此, 本文认为传统媒介对提升公众日常环境知识水平的能力强于网络媒介。与日常环境知识的直观性和实践性相比, 专业环境知识具有抽象性和理论性, 公众难以在日常

生活实践中获取专业环境知识。因此，专业环境知识更需要通过媒介对公众进行普及。但是大多数公众的日常生活对专业环境知识的需求较少，只有少部分公众在特殊情境下才会对专业环境知识有需求。所以，传统媒介对专业环境知识的传播量也相对较少。相较于传统媒介，网络媒介对专业环境知识在大众中的普及更具便捷性和广泛性的优势。传统科普机构利用迅速发展的网络媒介，面向公众普及包括专业环境知识在内的科学知识。一项针对学生的研究也表明，学生在获取一些日常生活中难以获取且重要的环境知识时的主要信息来源是互联网，其次是报纸，再次是电视、学校教育和期刊，互联网的重要性是书籍的五倍（Keinonen et al.，2014）。因此，网络媒介对专业环境知识的影响强于传统媒介。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2a 与假设 2b。

假设 2a: 公众使用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的频率越高，其日常环境知识水平也会越高，其中传统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的影响大于网络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的影响。

假设 2b: 公众使用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的频率越高，其专业环境知识水平也会越高，其中网络媒介对专业环境知识的影响大于传统媒介对专业环境知识的影响。

### （三）人口流动、信息媒介对环境知识的影响

前文的论述主要涉及人口流动、信息媒介对环境知识的直接影响。此外，人口流动还会通过信息媒介间接影响环境知识。首先，相较于未流动人口来说，流动人口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情感投入和人际信任会有所降低（王波，2007）。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从人际交往渠道获取新知识的可能性减少，转而会更多依赖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获取包括环境知识在内的信息。其次，虽然以往的研究提出了“信息赋权”和“信息鸿沟”两种观点，但二者在理解流动人口的信息媒介使用方面存在共同点。信息赋权论认为人口在流动过程中通过网络媒介，能获取多方面的社会支持和新的知识信息，进而有助于其融入流入地（Dekker & Engbersen，2013）。信息鸿沟论则主要认为流动人口接受信息的机会、能力和内容与流入地人口并不一致，流动人口内部也会有信息媒介利用能力的差异（吴丽丽，2017；刘谦、陈香茗，2017）。但信息鸿沟论也强调农民工在流动中会通过信息媒介能获得比以往更多的环境知识（聂伟、梁婷婷，2019）。需要注意的是，以往的研究认为流动人口使用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的频率与目的存在差异。早期的研究发现，报刊是流动人口获取新闻资讯和日常生活知识的主要来源（托马斯、兹纳涅茨基，2000：13）。在电视普及的年代，电视是流动人口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来源（杭孝平，2009），流动人

口通过电视获得社会资讯、健康知识等日常信息（郑素侠，2012）。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网络媒介代替电视等传统媒介，成为流动人口主要使用的信息媒介。与通过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介获取日常生活知识有所不同，网络媒介在流动人口社会资本形成、身份建构等方面发挥着区别于传统媒介的独特作用（丁未、田阡，2009；高涵，2014；侯东栋、王晓慧，2018）。流动人口还能通过网络媒介方便地交流最新的专业知识（石雅洁，2021）。这说明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能为流动人口提供不同类型的知识。虽然以往的研究较少专门探讨人口流动、信息媒介与环境知识三者的关系，但结合前文有关传统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影响更大，网络媒介对专业环境知识影响更大的分析，以及流动人口通过电视、报刊传统媒体获取日常生活知识，本文认为，传统媒介在人口流动与日常环境知识之间的间接效应大于网络媒介的间接效应，网络媒介在人口流动与专业环境知识之间的间接效应大于传统媒介的间接效应。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3a 与假设 3b。

假设 3a: 分别以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为中介变量，人口流动对日常环境知识有正向间接影响，传统媒介的中介效应大于网络媒介的中介效应。

假设 3b: 分别以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为中介变量，人口流动对专业环境知识有正向间接影响，网络媒介的中介效应大于传统媒介的中介效应。

#### （四）研究问题

本文主要研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流动性要素对环境知识的影响情况，分析人口流动与信息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的直接影响。第二，虽然有信息赋权论和信息鸿沟论两种作用机制的争论，但对不同信息媒介对不同类型环境知识作用机制进行比较分析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在进行中介机制分析时，将比较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与专业环境知识影响的差异。基于以上研究问题，本文的分析框架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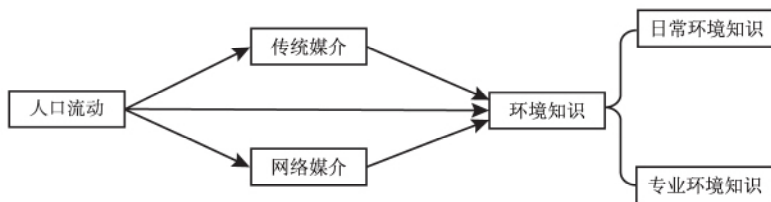


图 分析框架

### 三、数据、变量与测量

#### (一) 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2013年采集的数据,即CGSS2013。<sup>①</sup>该项目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样本覆盖了全国28个省份的491个村/居委会。村/居委会内部的抽样采取地图抽样法获取被访家庭户,末端的家庭户内的抽样采用Kish表,从满18岁的家庭成员中抽取一人进行访问。总共抽取12000个调查对象,最终获得11438份有效问卷。

#### (二) 变量及其测量

##### 1. 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人口流动与信息媒介对公众环境知识的影响。公众环境知识是本文的因变量。CGSS2013问卷利用10个题目构成环境知识量表。<sup>②</sup>被访者对10个题目的表述分别进行判断,在重编码过程中,被访者判断正确,编码为1,判断错误或不知道,编码为0。10个题目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826,信度水平较高。按照表面效度,重编码后的10个题目可以分为两组,其中第7、8、9三个题目构成一组,其余七个题目构成一组。对两组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各自构成一个综合变量,分别命名为专业环境知识和日常环境知识。专业环境知识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602,信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日常环境知识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808,信度水平较高。两个变量的得分越高,表示其对应的环境知识水平越高。

##### 2. 自变量与中介变量

人口流动是本文的自变量。本文以居住地的变化来界定人口流动。CGSS2013问

<sup>①</sup> 截至目前为止,在公开的大型调查数据中,CGSS2013是最新的包含环境模块的数据库。

<sup>②</sup> 这10个题目分别为:1. 汽车尾气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2. 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会导致环境破坏;3. 含磷洗衣粉的使用不会造成水污染;4. 含氟冰箱的氟排放会成为破坏大气臭氧层的因素;5. 酸雨的产生与烧煤没有关系;6. 物种之间相互依存,一个物种的消失会产生连锁反应;7. 空气质量报告中,三级空气质量意味着比一级空气质量好;8. 单一品种的树林更容易导致病虫害;9. 水体污染报告中,V(5)类水质意味着要比I(1)类水质好;10. 大气中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会成为气候变暖的因素。其中错误表述项为1、3、5、7、9,正确表述项为2、4、6、8、10。

卷中有提问“您是哪一年来到本地（本区/县/县级市）居住的？”。有两个选项供被访者选答，一是填写具体居住地变化年份，二是选择“自出生起一直就住在本地”。本文将该问题处理为“人口流动”变量，即如果被访者填写了具体的居住地变化年份，说明其居住地有过变化，视为发生过“流动”，编码值为1；如果被访者选择“自出生起一直就住在本地”，则视为其居住地未发生过变化，视为未发生过“流动”，编码值为0。

信息媒介是本文的中介变量，本文借鉴詹格（Jang et al., 2019）等人的研究，将信息媒介操作化为“使用媒体的频率”。CGSS2013 问卷提问的题目为“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体的使用情况是？”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共计6种。被访者针对每种媒介的使用频率有5个选项，分别为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分别将五个选项值编码为1—5，值越大，被访者使用媒介的频率越高。本文基于研究需要将该题编为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两个变量。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将前四种媒介和后两种媒介的使用频率分别综合为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的使用频率，综合后的值越大，说明公众使用该类媒介的频率越高。两类信息媒介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分别为0.710和0.671，信度都在可接受范围内。

### 3. 控制变量

本文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和现居住地共5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为二分变量。年龄为问卷调查年份2013减去被访者的出生年份，为连续变量。教育水平根据最高的受教育程度对应的年限进行编码，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编码为0，小学和私塾编码为6，初中编码为9，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和技校编码为12，专科编码为15，本科编码为16，研究生及以上编码为19，该变量为连续变量。收入为个人在2012年的总收入，以万元为单位，为连续变量。现居住地以被访者受访时居住地类型为依据进行划分，原始问卷里包括“市/县城的中心城区”“市/县城的边缘城区”“市/县城的城乡结合部”“市/县城以外的镇”“农村”共5个选项值。本文将前4项做为城镇并编码为1，将“农村”编码为0，为二分变量。

表1为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日常环境知识的平均分为3.91，专业环境知识平均分为0.77；发生过流动的人口占比为26.06%，占样本量的比例较小；传统媒介使用频率的均值9.87，网络媒介使用频率的均值为3.83。



表 1 变量的描述统计 (N = 11438)

| 变量                    | 数据类型 | 分布描述                              | 取值范围  |
|-----------------------|------|-----------------------------------|-------|
| 因变量                   |      |                                   |       |
| 日常环境知识 <sup>*</sup>   | 连续变量 | 平均数 = 3.91, 标准差 = 2.26            | 0—7   |
| 专业环境知识 <sup>*</sup>   | 连续变量 | 平均数 = .77, 标准差 = .94              | 0—3   |
| 自变量和中介变量              |      |                                   |       |
| 人口流动                  | 二分变量 | 未流动 = 0 (73.94%), 流动 = 1 (26.06%) | 0—1   |
| 传统媒介使用频率 <sup>*</sup> | 连续变量 | 平均数 = 9.87, 标准差 = 2.92            | 4—20  |
| 网络媒介使用频率 <sup>*</sup> | 连续变量 | 平均数 = 3.83, 标准差 = 2.32            | 2—10  |
| 控制变量                  |      |                                   |       |
| 性别                    | 二分变量 | 女 = 0 (49.68%), 男 = 1 (50.32%)    | 0—1   |
| 年龄                    | 连续变量 | 平均数 = 48.59, 标准差 = 16.39          | 18—97 |
| 教育水平                  | 连续变量 | 平均数 = 8.77, 标准差 = 4.67            | 0—19  |
| 个人年收入 (万元)            | 连续变量 | 平均数 = 2.38, 标准差 = 3.48            | 0—100 |
| 现居住地                  | 二分变量 | 农村 = 0 (38.61%), 城镇 = 1 (61.39%)  | 0—1   |

注: <sup>\*</sup> 为更直观地呈现这些变量的分布情况, 此表汇总的是这类变量原始得分加总后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后文的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将采用对这类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生成的数值。

## 四、分析结果

### (一) 人口流动、信息媒介对环境知识的影响

表 2 给出了人口流动、信息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为便于比较不同因素对环境知识影响的大小, 表中列出了标准化的回归系数。在对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影响因素的分析中, 首先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将人口流动、信息媒介分别纳入模型进行分析, 然后再将上述变量同时纳入模型。分析结果发现, 模型 3 和模型 6 的调整  $R^2$  值分别大于其它几个模型, 说明在对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的分析中, 这两个模型的拟合程度较优。因此, 下面主要根据模型 3 和模型 6 的分析结果进行解释。

表 2 人口流动、信息媒介对环境知识的影响<sup>①</sup>

| 变量                | 日常环境知识              |                     |                     | 专业环境知识              |                    |                    |
|-------------------|---------------------|---------------------|---------------------|---------------------|--------------------|--------------------|
|                   | 模型 1                | 模型 2                | 模型 3                | 模型 4                | 模型 5               | 模型 6               |
| 性别 (男 = 1)        | .051 ***<br>(.017)  | .045 ***<br>(.017)  | .048 ***<br>(.017)  | .027 **<br>(.019)   | .025 **<br>(.018)  | .025 **<br>(.018)  |
| 年龄                | -.116 ***<br>(.001) | -.119 ***<br>(.001) | -.120 ***<br>(.001) | -.042 ***<br>(.001) | .011<br>(.001)     | .011<br>(.001)     |
| 教育水平              | .322 ***<br>(.002)  | .265 ***<br>(.003)  | .264 ***<br>(.003)  | .186 ***<br>(.003)  | .110 ***<br>(.003) | .110 ***<br>(.003) |
| 个人年收入             | .027 **<br>(.003)   | .018 *<br>(.003)    | .015<br>(.003)      | .053 ***<br>(.003)  | .027 **<br>(.003)  | .027 **<br>(.003)  |
| 居住地 (城镇 = 1)      | .133 ***<br>(.019)  | .118 ***<br>(.019)  | .112 ***<br>(.019)  | .083 ***<br>(.021)  | .050 ***<br>(.021) | .050 ***<br>(.021) |
| 人口流动 (流动 = 1)     | .031 ***<br>(.019)  |                     | .030 ***<br>(.019)  | .002<br>(.021)      |                    | -.000<br>(.021)    |
| 传统媒介使用频率          |                     | .108 ***<br>(.010)  | .108 ***<br>(.010)  |                     | .096 ***<br>(.011) | .096 ***<br>(.011) |
| 网络媒介使用频率          |                     | .049 ***<br>(.011)  | .048 ***<br>(.011)  |                     | .175 ***<br>(.012) | .175 ***<br>(.012) |
| N                 | 11438               | 11438               | 11438               | 11438               | 11438              | 11438              |
| 调整 R <sup>2</sup> | .234                | .241                | .242                | .080                | .101               | .102               |

注: (1)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2) 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3) 括弧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模型 3 的分析结果显示, 人口流动对日常环境知识有显著正向影响, 即相对于没有流动的人群, 流动人口的日常环境知识水平更高,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 (Pfeffer & Stycos, 2002; Qin & Flint, 2012), 假设 1a 通过验证。传统媒介使用频率和网络媒介使用频率两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值分别为 0.108 和 0.049, 这说明使用两类媒介越多的人群, 其日常环境知识水平越高, 其中传统媒介使用频率对日常环境知识水平的影响大于网络媒介使用频率对日常环境知识水平的影响, 假设 2a 通过验证。

<sup>①</sup> 对模型 3 和模型 6 分别进行了多重共线性的分析, 检验了 2 个模型是否存在共线性情况。分析结果是, 模型 3 和模型 6 的 VIF 平均值为 1.48, 最大 VIF 值为 2.14。2 个模型的平均 VIF 值都小于 2, 最大 VIF 值都远小于 10。因此可以说四个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风险 (谢宇, 2010: 188—191)。

模型 6 的分析结果显示, 人口流动对专业环境知识没有显著影响, 即无论是否有流动, 公众的专业环境知识水平并无显著差异, 假设 1b 通过验证。传统媒介使用频率、网络媒介使用频率对专业环境知识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两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 0.096 和 0.175。说明使用传统媒介、网络媒介越多的人群, 其专业环境知识会更高。相对于传统媒介来说, 网络媒介对专业环境知识的影响更大, 假设 2b 通过验证。

对比自变量对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的影响情况, 一是人口流动只对日常环境知识有显著正向影响, 对专业环境知识并无显著影响。二是传统媒介使用频率对日常环境知识的影响最大, 而网络媒介使用频率对专业环境知识的影响更大。总的来说, 自变量影响两类环境知识水平的强弱程度存在差异。

## (二) 中介效应分析

为更完整地了解人口流动、信息媒介对环境知识的影响机制, 本文采用路径分析方法, 分析信息媒介在人口流动与环境知识之间的中介效应, 以及人口流动对环境知识的直接效应。路径分析模型的整体适配度符合标准, 见表 3。

表 3 人口流动对环境知识影响的效应分解

| 效应名   | 路径   | 日常环境知识 |      |      | 专业环境知识 |      |      |
|-------|--|--------|------|------|--------|------|------|
|       |  | 效应值    | SE   | p    | 效应值    | SE   | p    |
| 中介效应  | 人口流动→传统媒介→环境知识   | .002   | .002 | .057 | .000   | .002 | .451 |
|       | 人口流动→网络媒介→环境知识   | .000   | .001 | .788 | .003   | .003 | .006 |
| 直接效应  | 人口流动→环境知识  | .030   | .008 | .000 | -.000  | .009 | .976 |
| 模型适配度 | $\chi^2 = 78.460$ CFI = .994 TLI = .958 RMSEA = .047 SRMR = .011 |        |      |      |        |      |      |

注: 效应值为标准系数。

表 3 给出了人口流动对环境知识影响的效应分解情况。在日常环境知识方面, 传统媒介的中介效应标准系数为 0.002 ( $p = 0.057$ ), 网络媒介的中介效应标准系数为 0.000 ( $p = 0.788$ ), 传统媒介的中介效应显著, 而网络媒介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假设 3a 通过验证。在专业环境知识方面, 传统媒介作为人口流动与专业环境知识的中介变量时, 中介效应不显著 ( $\beta = 0.000$ ,  $p = 0.451$ )。以网络媒介作为人口流动与专业环境知识的中介变量时, 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 $\beta = 0.003$ ,  $p = 0.006$ ), 网络媒介的中介效应大于传统媒介的中介效应, 假设 3b 通过验证。

##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 CGSS2013 数据,从流动性视角分析了人口流动和信息媒介对公众环境知识的影响。与以往有关人口流动对环境知识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农民工和移民等特定人群不同,本研究基于全国性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以一般性的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结论更具有一般性和可推论性。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区分了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比较了人口流动通过不同信息媒介对公众日常环境知识、专业环境知识的影响效应。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如下三点主要结论。

首先,本文分别分析了人口流动对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的直接影响。结果显示,人口流动对日常环境知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相对于没有流动的人口来说,流动人口的日常环境知识水平会更高,证实了人口流动促进日常环境知识水平增长的结论(Wong et al., 2019; Qin & Flint, 2012; Cheung et al., 2014)。人口流动能促使环境知识在公众间的交流和互补,特别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城市里的生活和工作让他们有更多机会获取新的日常环境知识。但分析结果也显示,人口流动对专业环境知识并无显著影响。这说明,相对于没有流动的公众来说,人口流动本身并不会对流动人口的专业环境知识产生直接影响,这可能与大多数流动人口难以直接接触到专业环境知识有关。

其次,研究结果显示,传统媒介、网络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和专业环境知识都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分析发现,虽然传统媒介对日常环境知识的直接效应大于网络媒介的直接效应,但网络媒介对专业环境知识的直接效应大于传统媒介的直接效应。这不仅说明信息媒介确实能对公众的环境知识发挥教育功能,也说明两类信息媒介对公众的环境知识教育效果存在差异。这与不同类型的媒介传播特征和承载的信息特征有关。传统媒介需要传播与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信息,才能吸引更多受众和获得更多的媒介市场份额。日常环境知识与公众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因此,传统媒介对公众日常环境知识的提升具有更大作用。公众的日常生活对专业环境知识需求量较小,即使使用传统媒介传播专业环境知识,也难以达到精准传播。而网络媒介便捷的搜索功能有助于实现专业环境知识的精准传播。因此,网络媒介对公众专业环境知识水平的影响更大。

最后,本文进一步分别以两类信息媒介为中介变量,分析其在人口流动与环境

知识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显示,以传统媒介为中介变量时,人口流动对日常环境知识有间接影响,对专业环境知识并无显著的间接影响。以网络媒介为中介变量时,人口流动对专业环境知识有显著的间接影响,而对日常环境知识并无显著的间接影响。部分证实了信息媒介在人口流动与环境知识之间的赋能作用(郑素侠,2010; Dekker & Engbersen, 2013)。社会融入机制(Pfeffer & Stycos, 2002)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主要是指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的社会主流群体中,同等获取社会资源和在社会认知上去差异化的动态过程(崔岩,2012)。其中,信息是流动人口融入社会过程需要借助的资源。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共同构成现代信息和知识的传播媒介。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进行社会融入需要从各种媒介获取新知识,如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中能获取最新的垃圾分类知识和环境保护技能等。媒介传播的信息成为流动人口完成社会融入需要借助的重要资源。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在人口流动与两类环境知识之间各自发挥了不同的中介作用。这说明,相对于非流动人口来说,流动人口主要通过传统媒介获取日常环境知识,但在获取专业环境知识方面,网络媒介的中介作用更加显著。综合第二和第三点结论,两类信息媒介对两类环境知识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存在差异。如果说公众的日常环境知识更多源于日常生活体验,专业环境知识更多源于系统的科学研究。那么,传统媒介在传播日常生活知识方面的效果更好,而网络媒介在传播专业科学知识方面的效果更优。

本文基于流动性视角对公众环境知识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有助于加深对流动性社会中公众获取环境知识的机制的理解。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需要重视对我国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进行环境知识的普及,重视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对普及环境知识的作用,构建提高流动人口环境知识的有效机制。同时,也需要注意,部分人群并未完全适应流动性社会的生活方式,在制定普及环境知识的政策时,需要有针对性的环境教育机制和制度对这部分人群输入环境知识,从而避免在不同人群间形成更大的环境知识鸿沟。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是在理论方面,流动人口在流动方向和社会阶层等方面都存在多样性,但由于CGSS2013并未调查被访者流动前的城乡属性,本文无从知晓被访者的流出地和流动方向,因此没有分析不同的人口流向对环境知识的影响,也未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流动人口在环境知识水平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这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利用更恰当的数据资料再进行研究。二是,从媒介传播

渠道讲, 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也是环境知识重要的传播渠道, 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数据, 本文只聚焦了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两类信息传播渠道对环境知识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鲍曼, 齐格蒙特, 2013, 《全球化: 人类的后果》, 郭国良、徐建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程萧潇、孟伦, 2016, 《媒介使用对受众环境意识的影响——基于 CGSS2010 的数据应用》, 《全球传媒学刊》第 4 期。
- 崔岩, 2012, 《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 丁未、田阡, 2009, 《流动的家園: 新媒体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第 1 期。
- 段文杰、盛君榕、慕文龙、关远, 2017, 《环境知识异质性与环保行为》, 《科学决策》第 10 期。
- 高涵, 2014, 《媒介使用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构建》,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4 期。
- 杭孝平, 2009, 《北京市流动人口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与分析》, 《新闻窗》第 6 期。
- 何兴邦、周葵, 2016, 《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影响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 8 期。
- 洪大用, 2013, 《关于中国环境问题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考》, 《探索与争鸣》第 10 期。
- 2017, 《社会治理的关键是治理流动性》, 《社会治理》第 6 期。
- 洪大用、范叶超, 2016, 《公众环境知识测量: 一个本土量表的提出与检验》,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 4 期。
- 侯东栋、王晓慧, 2018, 《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 从疏离到结缘——基于差序格局理论的分析》, 《西北人口》第 1 期。
- 吉登斯, 安东尼, 2000, 《现代性的后果》, 田禾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卡斯特, 曼纽尔, 2001, 《网络社会的崛起》, 夏铸九、王志弘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6, 《认同的力量》, 曹荣湘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刘谦、陈香茗, 2017, 《微信中的生命时间——对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数字鸿沟研究的一个维度》, 《社会学评论》第 2 期。
- 刘少杰, 2012,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 《学术月刊》第 10 期。
- 聂伟、梁婷婷, 2019, 《城市融入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环保行为吗? ——基于 CGSS 数据的实证分析》,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4 期。
- 施生旭、甘彩云, 2017, 《环保工作满意度、环境知识与公众环保行为——基于 CGSS2013 数据分析》, 《软科学》第 11 期。
- 石雅洁, 2021, 《以新媒体推进信息与知识传播方式变革》, 《新闻传播》第 14 期。
- 托马斯, W. I. F. 兹纳涅茨基, 2000,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张友云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王波, 2007, 《流动人口的社会空间与人际传播》,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3 期。
- 王谦、文军, 2018, 《流动性视角下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反思》,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 期。
- 王文略、王倩、余劲, 2018, 《我国不同群体环境教育问题调查分析——以陕宁渝三地为例》,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 6 期。

- 吴丽丽, 2017, 《新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影响研究》, 《农业经济》第4期。
- 吴越菲, 2017, 《地域性治理还是流动性治理? ——城市社会治理的论争及其超越》,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谢宇, 2010, 《回归分析》,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康之, 2019a, 《论流动性提出的社会治理变革要求》,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2019b, 《论社会治理中的理性知识与经验知识》, 《学习论坛》第5期。
- 郑素侠, 2010, 《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与分析——基于河南省郑州市的调查》,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第10期。
- 2012, 《媒介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当代传播》第5期。
- 周全、汤书昆, 2017, 《媒介使用、信息认知能力与公众的环境科学知识获取——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的实证研究》, 《科学学研究》第4期。
- 朱慧, 2017, 《环境知识、风险感知与青年环境友好行为》, 《当代青年研究》第5期。
- Brothers, C. C., R. W. Fortner & V. J. Mayer 1991, "The Impact of Television News on Public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2 (4).
- Chan, K. K. W. 1998, "Mass Media and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 *Environmentalist* 19 (2).
- Cheung, L. T. O., L. Fok, E. P. Tsang, W. Fang & H. Y. Tsang 2014, "Understanding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in a Metropolitan City of Hong Kong, China."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1 (4).
- Dekker, R. & G. Engbersen 2013, "How Social Media Transform Migrant Networks and Facilitate Migration." *Global Networks* 14 (4).
- Gu, P. & X. M. Ma 2013,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a Floating Population's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 Case Study in the Shawan River Basin in Shenzhen,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39.
- Jang, S. M., B. W. McKeever, R. McKeever & J. K. Kim 2019, "From Social Media to Mainstream News: The Information Flow of the Vaccine-Autism Controversy in the US, Canada, and the UK." *Health Communication* 34 (1).
- Jensen, B. B. 2002, "Knowledge, Action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8 (3).
- Kamaludin, N. A. & V. How 2016, "The Ine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Awareness among Foreign Immigrants and Local Blue-Collar Workers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Environmental Justice* 9 (6).
- Keinonen, T., E. Yli-Panula, M. Svens, R. Vilkonis, C. Persson & I. Palmberg 2014,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Media-Students' Perceptions in the Three Nordic Baltic Countries." *Nephron Clinical Practice* 16 (1).
- Lee, K. 2011, "Understanding Hong Kong Adolescents' Environmental Intention: The Roles of Media Exposure, Subjective Norm,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pplie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 Communication* 10 (2).
- Ostman, R. E. & J. L. Parker 1987, "A Public'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Evaluations of Mass Media."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8 (2).

- Pfeffer , M. J. & J. M. Stycos 2002, "Immigrant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in New York City. "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3 ( 1 ) .
- Qin , H. & C. G. Flint 2012, "Integrating Rural Livelihoods and Community Interaction into Migration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Rural Out-Migr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5 ( 10 ) .
- Robelia , B. A. , C. Greenhow & L. Burton 2011, "Environmental Learning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Adopting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s. "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17 ( 4 ) .
- Sampei , Y. & M. Aoyagi-Usui 2009, "Mass-Media Coverage , Its Influence on Public Awareness of Climate-Change Issues , and Implications for Japan ' s National Campaign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9 ( 2 ) .
- Stern , P. C. 2000, "Toward a Coherent Theory of 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r. "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6 ( 3 ) .
- Westerman , D. , P. R. Spence & B. V. D. Heide 2014, "Social Media as Information Source: Recency of Updates and Credibility of Information. "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9 ( 2 ) .
- Wong , C. , H. C. Wu , E. G. Cleary , A. P. Patton , A. Xie , G. Grinstein , S. Koch-Weser & D. Brugge 2019 , "Visualizing Air Pollution: Commun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Information in a Chinese Immigrant Community. "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4 ( 4 ) .

作者单位: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 包智明)

重庆科技学院法政与经贸学院 ( 颜其松)

责任编辑: 郭云蔚



Population Mobility , Media Use , and Public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 Bao Zhiming & Yan Qisong 193

**Abstract:** Drawing on data from CGSS 2013 ,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igration experience and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 which consists of daily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 DEK) and profession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 PEK)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mobility theory. We regarded the usage of traditional media and internet media , as potential mediators. Our findings reveal a direct linkage between migration experience and DEK rather than PEK. While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media on DEK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internet media , internet media exerts a greater influence on PEK than does traditional media. In addition , migration experience has a greater indirect effect on DEK through traditional media , but internet media is a more critical media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tion experience and PEK. This study shows heterogeneity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edia and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contributes to public policies for popularizing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in a mobile society.

Gener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Early-Stage *Danwei*: A Case in Harbin between 1946 and 1956 ..... Xue Wenlong 209

**Abstract:** What is the nature of *Danwei* ( work units) in China?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 we need to go beyond the following two perspectives , i. e. , “*Danwei* as an organization” and “*Danwei* as a system” . This article studies *Danwe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 It looks into urban governance practices in the early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Harbin between 1946 and 1956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logic and practical mechanism of *Danwei*. The paper shows how the early-stage *Danwei* generated and continuously expanded its functions , such as urban population governance , so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 mobilization , services , etc. , and finally became a highly complex “organization-space” unit and a new type of community.

Negotiated Governance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Led Model: A New Possibility for Land Acquisition and Demolition ..... Shi Min 226

**Abstract:** Land taking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s urban governance transforms into service-oriented , officials focus on keeping the balance of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Based on a case of land acquisition and demolition in Shenzhen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governance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The study shows that in the practice of land governance , the government mobilizes resources through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and establishes a performance incentive system and a policy system to stimulate officials to complete governance tasks. In addition , the government embeds local culture and social networks to “lubricate” governance behavior. There is no “black box” operation in the land governance in this case ,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